

威權體制下的中央日報*

鄭任汶**

目次

壹、導論

貳、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部隊

一、筆的隊伍

二、黨的「喉舌」－中央日報

參、民主化的衝擊

一、解嚴之後

二、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肆、黨的文化工業

一、黨媒複合體

二、左右為難的黨報

伍、結論

附錄一：中央日報與政治變遷之對照表

附錄二：威權時代「現階段加強文化審檢工作」責任區分

* 本文曾發表於2021年12月17日「解構黨產」學術研討會，感謝當日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博士精闢與具啟發性的評論，作者參酌與會先進的評論，以及二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進而修改本文，惟一切文責自當由作者自負。

**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的目的，係在透過歷史文獻的研究，從整體政治變遷的視角，針對 1949 年之後，威權體制下黨營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並以足以稱為代表性「喉舌」的中央日報為例，探究其作為中國國民黨黨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包括：意識形態工具、傳達重要黨政訊息、形塑輿論、打擊反對者，以及穩定社會等，其中，在國民黨所塑造以黨報為核心的「黨媒複合體」之中，黨報的編輯與經營也時常陷入矛盾，甚至受到政治派系鬥爭的影響而呈現左右為難 (dilemma) 的情境，致使作為媒體的公信力與信任感，快速的消耗殆盡，再加上民主化的浪潮與媒體環境的變遷，網路與新媒體的逐漸崛起，媒體營收虧損連連，經營陷入困境，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最終只好宣告停刊。本文研究結果，希望有助於了解在黨營事業中黨報的經營歷程，特別是媒體所該有的本質與黨報角色之間的衝突性，以及，理解在政治變遷的過程中，在政黨直接或間接資源挹注的情況下，黨報所享有的特權地位；期待透過系統化解析黨報在威權政黨之下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以提供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之參考。

關鍵字：黨報、國民黨產、中央日報、媒體、報業。

壹、導論

在所謂的民主政治國家中，媒體扮演著監督行政權、立法權，以及反映民意的角色，因此，媒體被要求必須客觀中立，特別是應該站在權力的對立面，盡其所能的監督政府。媒體也被視為是行政、立法、司法等之外較為獨立的第四權 (the fourth estate)。不過，相對地站在媒體對立面的政黨或政治人物，他們握有政治權力，但也理解到媒體的影響力，因此總是試圖影響媒體的設立、經營與新聞或節目的產製過程，以壓制民意的展現，或營造對自己有利的政治情勢，此舉不但有助於政黨或政治人物鞏固權力地位，更有利於統治權的持續行使。

然而，我國在威權統治時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無法容忍具有政黨輪替意義的民主選舉，透過制度的設計，嚴格的法律限制與軍警檢調特的強制壓力，讓單一旦具獨占地位的政黨擁有執政權，威權政黨又透過政治權力的掌控，介入社會各個領域，經營工商企業，透過藉由權力換取金錢的「尋租」(rent-seeking) 行為¹，取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不同層面的控制地位。如此，威權政黨才可挾著高壓統治的權力，也壟斷著經營媒體的權力，致使執政黨由上而下控制著社會輿論與民意的展現，藉此全力鞏固其政權。在沒有民主化的威權時期，沒有實質民主意義的選舉，民意無法展現，無法左右政權，再加上沒有正常民主國家的輿論環境，更讓威權體制無法接受挑戰，最終，單一政黨永遠掌握著統治權力，人民意志受到極大的壓制。

1 李福鐘，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營企業，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8期，2008年2月，頁189。

1949 年至今的我國，即存在著由政黨直接經營媒體的案例，其設置目的在於傳達政黨理念、宣傳政黨主張或者論辯政治情勢等，如此特殊的媒體生態，也持續影響著媒體政治的發展。就媒體而言，在民主政治體制中，除非媒體有清楚的利益取向，否則媒體應該是要比政府與反對黨更要受人民的信賴，但傳播媒體通常有其個別的利益取向，此利益來自於政治上的權力、經濟上的財富，以及社會上的影響力。但是，當媒體為政黨所擁有，媒體與政黨就融為一體，透過傳播媒體控制著議程設定、議題框架效果，以及介入新聞產製過程等，塑造輿論，以影響民意，並在新聞議題操作的背後，滿足特定個人、團體或組織的利益，進而維繫特定政黨的政治權力。

在威權體制之下，政黨直接控制或擁有媒體的經營權，更促使媒體的存在與經營直接受到政黨的控制。本文透過歷史文獻的研究，從整體政治變遷的視角，旨在探討 1949 年之後，威權體制下黨營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並以足以稱為代表性「喉舌」的中央日報為例，探究其作為中國國民黨黨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包括：意識形態工具、傳達重要黨政訊息、形塑輿論、打擊反對者，以及穩定社會等，但其中，黨報的編輯與經營也時常陷入矛盾，甚至受到政治派系鬥爭的影響而呈現左右為難 (dilemma) 的情境，致使作為媒體的公信力與信任感，快速的消耗殆盡，再加上民主化的浪潮與媒體環境的變遷，網路與新媒體的逐漸崛起，媒體營收虧損連連，經營陷入困境，最終只好宣告停刊。

本文透過以下的分析架構，希望有助於了解在黨營事業中黨報的過去，媒體該有的本質與黨報角色之間的衝突性，以及，在政治變遷的過程中，透過法律的制定與行政部門的嚴密掌控，致使黨報所有享

有的特權地位，且在政黨直接或間接資源挹注的情況下，黨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以提供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之參考。

在研究安排上，本文將先進行文獻回顧，從宏觀的角度，探析黨報在威權體制下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特別是透過鑲嵌（embedded）在整體臺灣政治變遷的視角，更能探究且理解黨報的過去。再者，黨報畢竟是由政黨所直接經營的媒體，因此肩負著特定的政治使命，探知輿情、掌握民意動向之餘，更需要傳達重要黨政訊息、形塑輿論，甚至打擊反對者，以助於威權統治政黨控制社會，因此黨與黨報之間的直接隸屬關係，也使黨報成為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部隊，也就是黨的「喉舌」，但此與作為社會公器的第四權媒體，產生衝突與矛盾，也讓編輯、新聞採訪寫作、評論與社論，以及與媒體經營陷入左右為難的情境。

本文將先探究威權統治時期「意識形態部隊」的建立，因有鑑於1950年代國共內戰的慘痛教訓，國民黨建構威權統治體制之下的意識形態部隊，組成遍佈黨政軍教育與文化事業等各個角落的「筆的隊伍」，而扮演黨「喉舌」角色的中央日報，更是建立此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²的核心，意在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其中，所謂的霸權，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上，國民黨透過統治權力的地位，以威權統治主義由上而下的形式，建立某些媒體具有文化傳播上的優勢地位，並宰制著社會教育的各個角落。本文將從理解威權統

2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INTL PUB CO INC.,(1971/06/01), 轉引自, James Joll 著, 石智青校閱, 葛蘭西 (A. Gramsci), 桂冠出版社, 1992年。雖然 Gramsci 在 1971 年出版此書, 但綜觀國民黨建立文化事業獨占地位的過程與運作, 亦與 Gramsci 所指稱文化霸權的概念吻合, 同時, 雖然 Gramsci 主要是批判社會上的階級, 但國民黨也透過威權統治主義建立統治階級的優越性, 讓國家與社會成為一體, 建構為執政黨所利用的媒體霸權。

治意識形態部隊的黨組織改造、法律系統與賦予黨報經營特權等面向，展開對黨報所扮演角色與所處地位的解析。

直到 1987 年解嚴之後，民主化浪潮衝擊臺灣社會，執政黨也感受到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因此被迫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相較於其它民營報紙，黨報受限於既有的「使命」，無法「暢所欲言」，更無法如實報導，對於媒體而言，最重要的批判精神蕩然無存，變成只批判在野陣營，在立場上反民主與反開放，致使媒體的公信力與品牌價值江河日下。即便黨政軍特一手聯合全力支持黨報，另一手打壓其他不同立場的媒體，然而到了 1960 年代之後，黨報的訂閱與零售報份快速下降，過去強迫訂報、閱讀、刊登廣告等優勢難抵新興民營報紙的競爭，最終只好走入末路。本文亦將針對解嚴後的國內外政治情勢進行分析，以及此政治情勢變化對於黨報經營的衝擊，以理解黨報所面對的媒體經營環境。

1996 年的第一次總統直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連戰聯手當選，但國內政治情勢已經有所變化，「臺灣人」意識高漲，直到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中央日報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國民黨喪失執政地位，過去黨報所仰賴的訂報、閱讀、刊登廣告等「執政」優勢頓失。再加上，新興媒體、網路媒體的興起，傳統報業受到極大的衝擊，訂報與廣告業務遭到瓜分，最終，中央日報被迫轉型為網路媒體，並停止發行。

因黨而生，也為黨而活，此特殊性，再加上民主化的浪潮，解嚴、開放報禁，以及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政治局勢發展，網路與新媒體蓬勃發展的席捲媒體市場，最終，致使國民黨決定不再支撐

黨報，黨報只好宣告停刊，並轉型為網路媒體，但依然不敵外在環境的變化，虧損連連，喪失黨報存在的意義，最後在 2006 年 6 月 1 日宣布停刊，結束近八十年的中央日報歷史。

接續，本文針對黨的文化工業，提出「黨媒複合體」(party-media complex，簡稱：PMC) 的概念，即黨媒融合成為一體，透過政治力量，由上而下建構此一複合體，以作為意識形態的統治工具。然而，媒體的「天職」與黨報的「使命」，致使中央日的經營陷入矛盾，因為既被稱為媒體，但又無法真的完全扮演媒體的角色，必須在作為黨的「喉舌」與報導真實之間，彼此拉扯，黨報屢屢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此也致使黨報的社會公信力逐漸下降，媒體所賴以生存的核心價值也慢慢喪失。在日益競爭的媒體市場，黨報虧損連連，黨中央不堪資金缺口的負擔，而黨報又無法呈現出其存在的價值，國民黨喪失執政地位，更加添黨報生存的負擔，黨報最後始得走入歷史。

對威權統治下的執政黨而言，透過媒體的操作，可以操縱人（選）民對所有公共事務的認知，透過議程設定、框架效果，改變人們的前期意志，以及影響其政治判斷，最終形塑其政治認知。此為認知戰的一環，黨報的誕生、經營，乃至沒落，就宛如國民黨進行認知戰爭的武器，武器鏽蝕老化之後，終將被遺棄。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文尚不處理對於中央日報內部編輯、採訪寫作與新聞版面呈現的分析，此組織內部的研究攸關新聞產製過程與新聞報導之內容，留待未來繼續研究。特別是，中央日報的經營，是否存在著結構性的偏見 (structural bias) 與黨派性的偏見 (partisan

bias)³？受到組織恆久性的意識型態和政治偏好所影響，以及受到持續性的政黨因素而導致選擇性的報導或評論，以及，相關偏見如何影響著此媒體的運作模式，以及是否導致社會公信力逐漸滑落？都可能是未來可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另外，接收日產並隸屬於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為臺灣省政府）的新生報，以及 1946 年 2 月 20 日在台南創立另一黨報的中華日報，雖然也可以視為國民黨所經營，但其與黨的關係，以及在臺灣報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並不若中央日報的黨報色彩濃厚，再加上，其新聞走向以地方性新聞為主，因此不在本文所探討的範疇內。

在文獻回顧方面，在威權政黨的高壓統治之下，黨營事業所處的特殊地位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研究臺灣民主化、轉型正義、民主鞏固，以及臺灣政治經濟發展等範疇中非常重要的問題。威權政黨透過威權統合主義，由國家機器直接從上而下掌控社會的各個層面，部分透過接受日產，部分透過徵收、轉帳撥用、賤價收購等方式取得產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再由政黨並直接或間接經營黨營事業，舉凡投資、營建、開發、金融、瓦斯、媒體、保險、飯店等產業，幾乎無所不包，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至於教育文化或媒體事業，威權政黨更是嚴密控制，透過法令限制、經營上的特許、銷售上的協助等，讓直接隸屬政黨或親近政黨的媒體，擁有經營的特許，其中，最顯而易見的黨報-中央日報，即在此威權體制下，維持著「大報」的地位。

因此過去對於中央日報的研究，多從批判的角度出發，在戕害言

3 閻岩、周樹華，媒體偏見：客觀體現和主觀感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30 期，2014 年，頁 232。

論自由的黨國體制之下，直接隸屬於國民黨中央的黨報，被視為是黨營事業的一部分，同時被統治者用來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其目的是為了掌控人民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受到民主化浪潮與媒體改革開放的影響，中央日報最終被迫走入歷史⁴。相關研究分別從不同分析角度著手，包括：外在政治變遷、國民黨內部、文化層面、歷史途徑等，有論者區分為三大面向，第一、視為一般性產業的經濟學面向，第二、從傳播政治經濟學出發化約為權力與市場交換的研究面向，第三、制度或政治變遷對於中央日報的影響⁵。而在民主化之後，黨報的經營逐漸陷入困境，急於尋找出路，因此，另一研究方向則有關中央日報的政治文化與黨報轉型困境，描述黨報的論述陷入「看似奇怪而又合理」的景觀中，並提出應該排除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擴大內容的開放性、協商性和公共性，以及提出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等問題⁶，以及探究中央日報在黨國體制下所塑造出的優勢地位及其發展⁷。另外，對中央日報的研究，也經常被涵蓋在中國國民黨文化宣傳系統內之研究，特別是對國民黨宣傳部門，以及文工會職能所做之研究⁸。

4 例如：林麗雲，威權主義下臺灣電視資本的形成，中華傳播學刊，第9期，2006年6月；林麗雲，臺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79-1999，臺灣產業研究，第3期，2000年10月；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臺灣報業，新聞學研究，第95期，2008年4月，頁183-212；李福鐘，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事業，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8期，2008年2月，頁189-220；黃順星，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臺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第104期，2010年7月，頁113-160；朱彥碩，「臺灣光復」論述的建構—以《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1949-1987）為中心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5 唐海江，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中央日報為中心，新聞學研究，第97期，2008年10月，頁129。

6 同上註，頁127-177。

7 陳志昌，再起爐灶--《中央日報》的遷臺與在臺發展優勢，暨南史學，第18號，2015年7月，頁83-111。

8 例如：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221-262，以及，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

對中央日報作為黨報的研究，從戒嚴時期到解嚴之後，乃至民主轉型之後，有部分的研究成果，其中，許多研究均來自曾任國民黨黨職或中央日報編採人員，除了針對中央日報的定位、經營變遷、受到政治變遷影響的研究之外，亦提出改革的建議，特別是在面對民主轉型或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中央日報的經營應該做出改變的回應，此也反映出黨報在面對媒體角色與黨成員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成功的統治階級，就會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領導地位⁹」，媒體即是取得領導地位的武器或工具。若回顧臺灣戰後報業的發展過程，新聞場域的行動者處在不同力量牽引的社會空間中，經濟與文化資本的力量，也包括媒體內部在象徵資本之間的鬥爭，最後報業在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號稱自己是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以及必須依循經濟邏輯等力量之間拉扯¹⁰。此為一黨獨大統治時期威權統合主義的特徵，在報禁開放之前，刻意或放任大報與黨報成為寡占的集團¹¹，由上而下的統治著言論市場，並發展高度集中的利益代表組織¹²，黨報作為在新聞媒體中具有特權與獨佔利益的中介組織，極具黨國特色，並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然而，中央日報的編輯、記者等，畢竟也是新聞工作者的一份子，作為國民黨報，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黨報自有其採訪上的優勢，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9 Joll, James 著，石智青校閱，葛蘭西（A. Gramsci），桂冠出版社，1992 年，頁 107。

10 黃順星，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臺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第 104 期，2010 年 7 月，頁 114 和 151-152。

11 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臺灣報業，新聞學研究，第 95 期，2008 年 4 月，頁 200-201。

12 夏士芬，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也容易淪為統治者刻意放話或左右輿論的工具，但在採訪、撰稿或編輯等工作，與其他平面媒體雷同，依然是根據一般新聞產製過程而運作。亦有研究或黨報從業人員對於黨報的角色持不同的意見，例如：「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報，但是，只是產權屬於國民黨。他的經費，來自本身的發行與廣告收入，並非來自中央黨部。」、「中央日報的新聞來源，與其他報紙相同，由自己記者採訪，並沒有特別管道¹³。」然而，中央日報的高層人事命令，明顯是由「蔣總裁」透過中央黨部第四組的簽報所派任，以1972年9月接任社長的楚崧秋為例，當時即是由蔣總裁的新聞言論秘書兼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秦孝儀即將此人事安排告知楚崧秋，「我在個人記事錄中，秦先生的話如是說：『中央黨部第四組簽報上來的名單你並非第一個名字，是蔣總裁親自寫上去的』¹⁴。」黨報的高層人事由黨高層所決定，是必然的結果，也是黨控制黨報最核心的權力運作，致使黨報雖然也有媒體的角色，但黨中央牢牢掌握著人事的最終命令權，黨報必須聽令行事，相關的報導與言論走向即必須與黨的方向一致。

對於中央日報的研究，學術界部分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依然有所缺憾，其原因之一在於對於中央日報內部的分析文獻依然較為欠缺，僅能從領導者或黨報相關編採人員的回憶錄、年譜長篇、黨務系統內部會議紀錄和官方文書、黨務發展史料中初探黨部內部實際運作的情況，此部分也許尚待未來更多國民黨或黨報內部史料的公開，再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13 薛心銘，編輯台上-三十年代以來新聞工作剪影，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6月2日，頁7。
薛心銘從1972年9月至1979年1月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

14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記錄，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中研院民族研究所，2001年12月01日，頁102-103。

貳、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部隊

一、筆的隊伍

接續，本文透過三大面向的解析，進而理解威權統治政黨如何建立意識形態部隊，包括：黨組織的改造、建立威權統治的法律系統，以及賦予黨報經營的特許（franchise）權力。然後，再依此三條軸線，針對中央日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展開解析。

第一、在黨內的組織方面，中國國民黨建立專責媒體宣傳的部門，進行所謂的認知戰爭。國民黨成立宣傳部始於 1924 年，剛開始是負責黨內文告，但後來逐步擴張，透過黨報、通訊網的建立而建構屬於黨的宣傳系統，並以中央宣傳部為核心，抗戰期間併入軍事委員會第 6 組，直到 1950 年 3 月蔣介石「復行視事」，開始進行黨的改造，宣傳系統的職權由改造委員會第 4 組執行，1952 年 10 月第七屆全代會後，成為中央委員會的第 4 組¹⁵。第 4 組負責執掌宣傳、文化控制等所有的文藝、宣傳活動，1972 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工作會，2000 年文工會與中央黨史委員會再合併為文傳會。國民黨由上而下建立其意圖控制人民思想的意識形態部隊，歷任黨主席直接任命重要幹部擔任此部隊的指揮官，指揮著黨營媒體與親近的媒體，為黨宣傳，也替黨的立場或政策辯護，不管在威權時代或民主化之後，國民黨始終在組織內建立媒體宣傳部門，以執行黨中央的意志。

15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1 月，頁 223。其中，「瞭解中央政策」為黨內領袖決定中央宣傳主管的重要考量，例如抗戰時期，陶希聖獲得蔣介石之信任，得以出任中央日報副總主筆，負責撰寫社論，相關人事布局可詳見此文。

對國民黨而言，國共內戰的失利與喪失民意的支持息息相關，敗戰而退居臺灣的教訓，讓國民黨必須重新面對在媒體宣傳上的弱勢。就當時具有威權統治地位的中國國民黨而言，「電影戲院足為發揚文化宣傳主義之工具¹⁶」，即便連娛樂產業都被納入文化宣傳之工具，因此更狹義的傳播媒體就更不在話下。以接收日產所成立的中國廣播公司為例，在 1946 年從國民黨轄下的「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組為中國廣播公司之後，在遷台後，中廣即負擔起控制臺灣天空頻道的任務。至於中央日報，則是延續在中國大陸時期的黨報角色，繼續為威權政黨而服務。

第二、在建立威權統治的法律系統方面，195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即致力於建立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法律制度；其中，以戰時需求為由，實施報禁，透過限證、限張、限印等「三限」政策，讓臺灣報業陷入有限的競爭狀況¹⁷，回顧這段歷史，可追溯至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47 年，陳儀就任臺灣省行政長官，遂行由上而下的高壓統治，而為了支撐威權統治主義的政治體制，國民黨延續建立壓制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法律制度，國家透過立法、執法與行政機關的高壓統治，營造對統治者百分之百服從的媒體環境，絲毫不許異議聲音的出現，更不容任何挑戰執政黨的言論。

相關法律制度均凌駕憲法第 11 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的規定，1949 年 5 月 20 日頒布的戒嚴法，其第 11 條，「戒嚴

16 1946 年 10 月 22 日，時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拍發密電給南京黨中央之電文。引用自，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一），國史館，1966 年 12 月，頁 41。以及，李福鐘，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企業，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8 期，2008 年 2 月，頁 197。

17 同註 11，頁 185。

地域內，最高司令官有執行左列事項之權：一、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上述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必要時並得解散之。」賦予最高司令官取締任何的圖像、文字等出版品，只有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都可以依法停止。根據此法，亦訂定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管制辦法、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等，壓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人民任何的異議聲音都會國家機器所強制遏止。

1942 年 3 月制定的國家總動員法第 22 條亦規定「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報館及通訊社之設立，報紙、通訊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記載，加以限制、停止或命其為一定之記載。」也賦予行政機關「於必要時」得以限制或停止媒體的報導，此寬鬆的執法認定，讓行政機關有無限上綱的行政裁量權，幾乎任由行政機關自行認定執法時機，以壓制媒體的刊載與報導。

對於出版產業直接壓制的法源依據，最早來自於 1930 年頒布的出版法，以及隔年的出版法施行細則，後續的宣傳品審查標準、新聞檢查標準等¹⁸，直到 1949 年國府遷台之後，1952 年 4 月 9 日又公布施行的出版法修正案¹⁹，對新聞紙與雜誌進行嚴格的管制，其發行與出版採取登記制，根據第 9 條規定由行政院新聞局發給登記證，以及第 32 條，授予主管機關限制出版品登載事項，明定「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者。」、「觸犯妨害公務罪，妨害投票罪，或

18 林淇漾，戰後臺灣報禁政策之形成，臺灣學通訊，第 85 期，2015 年 1 月 10 日，頁 20。

19 出版法共 7 章 4 條，後因民主運動的推動，以及來自國內外的壓力，於 1999 年 1 月 25 日公告廢止。

妨害秩序罪者。」等不得登載。並於第 39 條賦予主管機關扣押的權限，觸犯者「得禁止其出售及散佈，必要時，並得予以扣押。」因此，欲申辦媒體者，受到限證政策的影響，人民無法享有言論自由，更壓制媒體只要被認定有顛覆國家社會者，均不得刊載。

1952 年 11 月 29 日接續公布的出版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被認為是報禁取得法源依據真正開始²⁰，該細則第 27 條：「戰時各省政府及直轄縣市政府為計劃供應出版品所需之紙張及其他印刷原料，應基於節約原則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調節轄區內之新聞紙、雜誌之數量。」再加上出版法施行細則第 6 條「同一新聞紙或雜誌另在他地出版發行者，或出版業另在他地設立分支機構者，均應依照出版法第九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先行申請核准登記。」針對出版者進行限地的規定，致使出版者無法跨地出版，限印的結果致使媒體傳播的能量遭到限縮；相關規定，被執政當局用來當作不許人民創辦新辦的行政命令²¹，限縮了人民的言論自由，且壓制不同意見的聲音。

此法律系統致使 1952 年至 1988 年，讓臺灣歷經長達 36 年的報禁年代，執政的國民黨透過三限一禁的政策，亦即：限證、限張、限印，再加上禁止發行。政府不發證，讓媒體數量無法成長，時期全臺的報紙維持著 31 家的規模²²，主要由國民黨黨營媒體與親近國民黨的媒體所組成，報紙更不能超過三大張，報紙更只能在登記地發行與設

20 同註 18，頁 20-21。

21 自由中國社論，創辦新報的限制該解除了吧！，自由中國，第 23 卷第 2 期，1960 年 7 月 16 日。

22 黃順星，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臺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第 104 期，2010 年 7 月，頁 113-160；以及，林淇漾，戰後臺灣報禁政策之形成，臺灣學通訊，第 85 期，2015 年 1 月 10 日，頁 20-21。

立機構。

第三、黨國獨佔壟斷傳播媒體的經營，其目的就為了鞏固統治權所需，在意識型態上控制著社會，以影響社會大眾對於政治的態度，因此，透過中央政府的補助與經營上的特許或特權，挹注特定的傳播媒體，可泛稱為威權政黨服務之「筆的隊伍」。此「陣容」，大致分為三類，(一) 政黨直接經營，諸如：中國廣播公司、中國電視公司、中國電影公司、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等，(二) 政黨與政府給予補助或經營上的特許與特權，包括：中央通訊社、中央月刊、東京自由新聞社、光華雜誌等，(三) 親近的媒體，例如：經營者即為國民黨中常委的中國時報、聯合報等。

在威權政體下，民營報業與官方維持著「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被稱為「侍從報業」(client press)²³。特別是對於黨中常委辦的中國時報、聯合報等而言，在威權體制之下的「大報」，具有影響力，但經營上又必須取得執政黨的同意，或稱「仰執政黨之鼻息」，特別是重大政治事件時，要成為執政黨對外的喉舌，更要揣摩「上意」，以協助執政黨製造政治氣氛與輿論情勢²⁴。亦即，利用政治上的管制邏輯，讓特定報業壟斷市場，成為市場上的優勢者，公共利益與讀者權益當然沒有受到保障，形同建立報業上的威權統合主義，由上而下嚴密控制著各個報業，並由執政的國民黨操控，報業協助威權體制進行洗腦、鞏固權力核心，以及，方便執政黨進行政治動員，遂行

23 林麗雲，臺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79-1999，臺灣產業研究，第 3 期，2000 年 10 月，頁 2-4。

24 陳佳宏，「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事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93-194。

其捍衛執政權的最終目的。

其中，1947年228事件後，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多家報社，均遭到查封，林茂生、阮朝日、黃旺成、許乃昌等報社菁英被迫逃亡，以及遭到逮捕、槍決，臺灣報業發展出現重大轉折²⁵，乃至1949年5月20日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戒嚴，以黨國機器控制報業、壓制言論自由，並塑造白色恐怖氣氛壟罩在臺灣的新聞事業，乃至1988年1月1日開放報禁，接受新報登記及增張，三家省市報業公會也公佈八點報業協議，限定張數放寬至6張，為期長達39年的報禁時期才暫告結束。

威權政黨透過恫嚇、入獄，甚至殺害，營造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目的即在控制民心，防止人民對統治者展該反抗，而相對於「民營」報業，受到黨國體制扶持與直接指揮的中央日報即享有經營的特權，接續，本文即以最動見觀瞻的黨報-中央日報為例，以作為威權體制下黨報的分析個案，以利理解黨國體制對於傳播媒體的嚴格控制與高壓統治。

二、黨的「喉舌」－中央日報

中央日報創刊於1928年，直到2006年5月31日發行最後一版，共發行28356號，長達79年，堪稱是全球中文報紙歷史最長的平面報紙²⁶。作為黨報，中央日報的發展歷程，與政治變遷息息相

25 同註18，頁20。

26 此段描述引述自漢珍數位圖書公司的中央日報全球影像資料庫介紹，https://www.lib.nccu.edu.tw/uploads/bulletin_file/file/5cd871cb1d41c867e3000f44/%E4%B8%AD%E5%A4%AE%E6%97%A5%E5%A0%B1.pdf，最後瀏覽日：2021/7/12。

關。國共內戰初期，有鑑於媒體宣傳戰，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征戰相當激烈，國民黨也經常居於劣勢。因此 1920 年 11 月國民黨在上海制定「中國國民黨總章」與「中國國民黨規約」，增設宣傳部，職權為「書報編纂及譯述事項、講演事項、教育事項」，此被視為是國民黨內常設宣傳機構的開端；1923 年進一步修正職權為「辦理本黨出版、演講及教育事項，並檢定本黨國內外一切出版物²⁷。」然而，1927 年開始一連串的國共內戰，國民黨在宣傳上無法擺脫弱勢，宣傳戰隨著實際的戰事，一步一步節節敗退，共產黨在宣傳上的優勢，再加上國民黨腐敗貪污的形象難以抹滅，更加速政治局勢的崩潰，部分知識分子與意見領袖向共產黨傾斜，也致使國民黨在戰事上節節敗退。

直到 1927 年 3 月 22 日，就在國民黨清黨前夕，國民黨左派在武漢創辦了中央日報，由親汪精衛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顧孟餘擔任社長，總編輯為後來加入共產黨的陳啟修²⁸，因此有論者認為顧孟餘創辦了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²⁹。但對於此段中央日報的起源，國民黨在其相關史料中，幾乎不提這一段，僅提及「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所辦的報紙，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次年遷移至首都南京³⁰」，或將此時期稱為「上海草創時期³¹」，以及「本報於民國十

27 張世瑛，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1928-31），國史館館刊，第 44 期，2015 年 6 月，頁 56。

28 陳啟修為中國第一位翻譯資本論的學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重慶大學擔任教授，被中國稱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先驅，可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站，<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16/0722/c85037-28575584.html>，最後瀏覽日：2016/3/4。

29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2020 年 5 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30 同註 13，頁 9。

31 耿修業，二十七年聞見瑣記，收錄於，中央日報編印，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1988 年 2 月 1 日，頁 166。

七年二月一日創刊於上海，十八年二月，遷移於首都南京³²。」不過，中央日報亦曾在出版刊物中，解釋此段歷史，「民國十六年三月，漢口曾有中央日報之發刊，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五日停刊，計共發行一百七十六號，因為當時武漢政治局勢，甚為混淆，報紙亦無保存可供查考，故本報仍以十七年二月一日為正式創刊之期³³。」中國國民黨與中央日報以局勢混淆、無報紙保存可查為由，忽略黨內左派人士擔任中央日報幹部之時期，並將此排除在中央日報的「正史」之外。

直到 1949 年遷至臺灣，國民黨本身更不願意提及黨內這段歷史，此當然與約 1927 年到 1930 年之間國民黨內兩股重要的派系勢力鬥爭有關，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中央與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改組派（或稱左派），雙方展開政治上的競逐，在宣傳上彼此攻訐，以及激烈爭奪輿論與民心的話語權。因此，若論及中央日報的起源，即充滿著國共內戰煙火的軌跡，南京中央與汪系的分歧，更呈現在當時的中央日報副刊-中央畫刊上，成為以南京中央為首攻擊汪系改組派的文宣工具³⁴，中央日報身為黨報，也受到來自政治領域的派系內鬥所影響，後期更是「經常有人想把這個報紙拿到自己手中，以便運用，有機會就會卡他一下；人事不能穩定，是中央日報的一大弱點。³⁵」

然而，中央日報被稱為是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及大陸執政時期之代表性喉舌」，隨著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中央日報依然一直是影響力

32 中央日報編印，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1988 年 2 月 1 日，頁 22。

33 同上註，頁 246。

34 張世瑛，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1928-31），國史館館刊，第 44 期，2015 年 6 月，頁 69。

35 同註 13，頁 11-12。

重大的重要報紙之一，或被稱為黨政機關報，足以忠誠傳達黨意，且成為重要的媒體宣傳工具³⁶。黨政消息的傳遞、黨政人事新聞的發布，乃至重要政策的釋出，或者傳遞執政當局對特定議題的表態等，全都是中央日報所曾經扮演的角色；甚至被稱為「撤台後，主要黨國宣傳喉舌³⁷。」中央日報扮演黨國體制下媒體宣傳工具的角色，不但在相關文獻中清楚的載明，更以機關報、宣傳喉舌、黨報等名稱自居。

《中央日報》發刊詞「本報為代表本黨之言論機關報，一切言論自以本黨之主義政策為依據。」此為做為黨報的使命，更是「天職」，蔣介石曾言，中央日報是「代表我的報紙³⁸。」其中，中央日報社長，也必須列席國民黨中常會，身分即為國民黨中常委，以 1972 年至 1981 年擔任中央日報董事長的曹聖芬為例，「每星期三上午參加中常會，下午便主持中央日報的主筆會議，說明常會的重要決議。中央日報的言論與編輯方針，即是由此而來³⁹。」來自黨中央的意志，直接成為處理新聞或新聞判斷的準則，此當然是黨報的必然，也是黨報之所有存在的理由。

對「領袖」的頌揚，更是中央日報的任務，除了日報內容之外，1976 年中央日報也出版「蔣總統秘錄」，以達成此項任務，書中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例如：「讀此書，最使人感動的是：總統的仁民愛物之襟懷，公忠體國的精神，與以天下為己任的真知灼見，貫通於現

36 翁智琦，反共所繫之處：冷戰前期臺港泰國民黨報紙副刊宣傳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 年 7 月，頁 15。

37 同註 7，頁 83。

38 同註 13，頁 12。

39 同註 13，頁 248。

代的史實之中⁴⁰。」中央日報理所當然地扮演起擁戴領袖的任務，其用詞極盡吹捧之用語，此為威權統治者的象徵，然而，此風氣卻為黨報所秉持的新聞編採走向與言論方針。

中國國民黨遷台前的 1947 年 2 月 28 日爆發二二八事件，不到一周，3 月 13 日出爐的第一次人犯調查，即將王添灯、徐征等報業菁英，入罪逮捕⁴¹，讓日治時期末期的臺灣本土報業遭受打擊，此也奠下其遷台後讓報業從業人員禁聲的基礎。同時期，在上海創刊的中央日報，也已走向公司化。1949 年 1 月 21 日蔣介石引退，國民黨撤遷來台，黨營的中央日報也隨著國府軍隊來台，3 月 12 日正式由南京遷台發行，最初三個月情況較為艱難，當年更發生火災，但隨後即恢復原狀⁴²。1949 年 5 月 19 日，時任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戒嚴令。此情勢發展更加深臺灣社會的恐怖氣氛，而此時，中國國民黨正準備全面接管臺灣，並進行高壓統治。10 月左右開始白色恐怖大逮捕。對於中央日報而言，在編務上，因政黨情勢改變，再加上以「中樞」的姿態，社論洞見觀瞻，報份發行數直線上升。

1950 年 2 月 23 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提請「總裁」復行總統職權，3 月 1 日正式復職⁴³，6 月 25 日韓戰爆發，臺灣政治情勢也改變，

40 中央日報譯印，蔣總統秘錄—恭祝總統八秩晉八華誕，全譯本第一冊，中央日報，1976 年 10 月 10 日，頁 5。此段文字出自，1972 年起奉派出任中央日報社發行人兼社長的楚崧秋。

41 阮美姝，1947 年消失的新聞界菁英展覽手冊，以及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玉山社，2015 年 2 月 17 日。其中，阮美姝為二二八事件中失蹤的前《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女兒，上述手冊來自於，阮女士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於台北市舉行「1947 年消失的新聞界菁英」展示會。

42 陳國祥、祝萍，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自立晚報社，1988 年，頁 41。

43 陳正茂，日治及戰後初期臺灣政黨與政治團體史論，元華文創，2020 年 4 月，頁 67。

美軍第七艦隊增防臺灣，中國武力犯台的可能性降低，而對臺灣國內情勢而言，國民黨更取得絕對的執政地位。黨報在此情勢變化之下，1953 年後，超越臺灣新生報、中華日報，成為第一大報。1958 年 5 月 15 日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更成為執行威權高壓統治的專責機構，黨報也成為獨一無二的黨的喉舌，並成為左右臺灣人民思想的控制工具。

1950、60 年代的臺灣，國民黨進行對教育、文化、媒體的全盤控制，掌控人民的「腦袋」，此段時期是臺灣異議聲音與民主運動非常沉寂的年代，少數的火花就只有以「自由中國」為傳播管道的不同聲音，以及遭到強制壓迫的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⁴⁴。但相對的，1960 年代也是國民黨開始將黨營事業朝向企業化經營的開始，此時期開設多家黨營事業，為奠定日後黨營事業發展的重要播種期，涵蓋貿易、水泥、製藥、電工、建築、石化、票券、保險、金融、保全、瓦斯、環保、海外投資等，幾乎囊括的國內所有的產業⁴⁵，在社會經濟層面上擁有相當的影響力。隨著黨營事業的拓展，黨報的經營也蓬勃發展，成為黨國體制報業最重要的角色。

然而，當時的中國國民黨中央也希望可以整頓中央日報，「各黨營文化事業，尤其是《中央日報》，均應一本大公無私之原則，切實

44 張富忠、邱萬興，綠色年代--臺灣民主運動 25 年，財團法人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2005 年 10 月 30 日，頁 18。其中，自由中國是由雷震等人於 1949 年所創辦，初期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政府也支持其創辦，但後因言論直接批判蔣介石政權，遭到壓制，在 1960 年雷震被捕後，只得停刊；亦可見，薛化元，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頁 241-286。

45 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黨營經濟事業的回顧與前瞻，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1994 年 12 月，頁 10-11。

整頓，並對無能力擔任工作之冗員設法予以淘汰⁴⁶。」、「《中央日報》為減少事業上之困難，必須注意人事之改進，凡非業務上所必須之人員，應予淘汰。五、三報經營方法仍不免陳舊，今後務須有專門人才，經常從事編輯印刷及各部門經營管理方法之研究改良。六、各報社論殊嫌冗長，應注意改進，每篇字數祇宜在五百至一千之間，過去《申報》社論即以精簡見長，實可取法⁴⁷。」顯見中國國民黨已經正視到黨報的經營問題，並將其視為是黨營企業的其中一份子，提出許多經營上的修正意見。

創刊於 1951 年並於 1957 年更名的聯合報，以及 1950 年創辦並於 1968 年更名的中國時報也開始崛起，同時也進入國民黨所主導的侍從體制，1960 年起，民營報紙的發行量就開始超過中央日報，黨報的經營面臨經濟上的壓力，1969 年此兩大報老闆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更讓此兩大報正式進入黨國體制。到了 1971 年中央日報每日發行量為 14 萬，聯合報已經是 26 萬，中國時報則是 24 萬⁴⁸；黨報的氣勢逐漸下滑，零售與訂閱的報份也快速下降，經營開始陷入危機。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辭世，中央日報全體前往瞻仰遺容，並發行追思特刊，年底並發行蔣總統秘錄⁴⁹。1978 年 5 月 20 日蔣經國就任總統，12 月 19 日中央日報刊登南海血書；中央日報堅守著黨國任

46 轉引自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篇，第 11 冊，頁 273-274，原出處：「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八二次會議紀錄」（民國 48 年 12 月 30 日），黨史館藏，館藏號：會 8.3/182。

47 轉引自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篇第 11 冊，頁 314-315，原出處：「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一〇次會議紀錄」（民國 49 年 4 月 20 日），黨史館藏，館藏號：會 8.3/210。此中常會，主要討論盜印取締及黨營報紙的改進計畫，其中本文中所指之三報為：香港時報、中華日報與中央日報。

48 同註 42，頁 114-115。

49 同註 32，頁 258。

務，繼續成為統治政黨對外進行輿論戰與控制民心的工具。此時，民心已經開始思變，反對力量也開始展現社會動員的能量。1979 年 8 月美麗島雜誌創辦，12 月 10 日爆發美麗島事件。1980 年後，中央日報的氣勢與業績跌落谷底，每年鉅額虧損連連，「該報在為政府宣傳、為黨宣傳的言論編採政策之下，陷入僵化的格局中，伸手伸展不開，滿紙官腔黨調，無法滿足讀者需求⁵⁰。」

1982 年國民黨黨營中央日報以 3.9 億元購入八德大樓，在黨國體制的扶植之下，雖然虧損連連，但依然以媒體公司的經營型態存在於臺灣社會，其採訪、編輯與言論等方向，當然是延續黨報的使命，以擁護執政的國民黨與打擊反對者為經營方向。然而，面對媒體的偏頗，也引來獨派人士採取激烈手段以表達不滿，1983 年 4 月 26 日發生聯合報與中央日報的爆炸案⁵¹，國家安全局、調查局、警總、警政署等跨部會單位成立專案小組，全面展開偵查工作，在國家機器總動員的情況之下，當年底即宣布破案⁵²。

1984 年 10 月 8 日，八德路大樓奠基，不過，1984 年後，中央日報依舊虧損，「每年約虧損兩三千萬元以上⁵³」，雖然當時臺灣經濟起飛，各行各業進入蓬勃發展期，但中央日報的經營依舊陷入困境。1985 年，隨著黨營事業管理單位的遷移，因此集中到臺北市忠孝西路

50 同註 42，頁 196。

51 陳儀深、曹欽榮、許文堂、陳銘城、林芳微等人訪問與紀錄，白色記憶：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訪談紀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 年，頁 686。

52 華視新聞網站，<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198312/198312121826786.html>，最後瀏覽日，2021/7/3。根據該新聞報導，「臺灣獨立聯盟主席張燦鎣是兩項爆炸案的主要策劃人；負責指揮的是臺灣獨立聯盟的首腦之一陳南天。他們指派巴西暴力份子李朝旺擔任整個陰謀案的執行指揮與接應的工作，然後安排主嫌犯黃世宗進行爆破工作。」

53 同註 42，頁 202。

一段的「中央保險大樓」營業，該棟大樓乃中央產物保險公司與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公司合建之 22 層建築⁵⁴。直到 1987 年始準備遷入八德大樓，6 月 24 日啟用八德路大樓。

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1987 年 7 月 14 日行政院隨著戒嚴令的解除，廢除高達 30 條的戒嚴法規，包括「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對於出版的管理由警總轉由新聞局，1988 年 1 月 1 日報禁解除，開始接受新辦報紙的登記與增張。至此，臺灣報業的生態產生劇烈的變動，受到威權統治所庇護的黨報，其經營與地位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報禁解除後，站在媒體監督或批判執政黨立場的報紙，開始進入言論市場，包括：自立早報、自立晚報，以及 1980 年 4 月 17 日創刊的自由日報（後於 1987 年更名為自由時報）。臺灣社會的報社，約略被分為兩大陣營，捍衛統治者與反對統治者，黨報以打擊對手、打擊敵人、鞏固統治為其任務，但另一方面，以言論自由、民主改革與具有臺灣本土意識的報社，則是頻頻挑戰威權政黨，質疑不經民主選舉而持續執政的正當性，雙方對峙並處於極端對立的狀態。

參、民主化的衝擊

一、解嚴之後

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政權，嚴密監控媒體，打擊所有的異議聲音，也讓真實的民意無法在公共領域上展現，國民黨甚至透過抹黑、醜

54 同註 45，頁 94。

化、逮捕等手段，壓制所有的反對力量，不過，隨著時代的改變，以及媒體環境的迅速發展，以民主陣營自居的國民黨政權，受到來自國際社會極大的壓力，國內反對勢力也蠢蠢欲動，民意開始覺醒，致使國民黨被迫走向民主化的道路。1984 年 10 月 15 日爆發江南案，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1986 年 5 月 19 日鄭南榕與黨外人士發起 519 綠色行動，直接挑戰威權統治，9 月 28 日民進黨成立，一連串的社會壓力，衝擊著國民黨的統治地位。

因此，在內外壓力的夾擊之下，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被迫解嚴，1988 年 1 月 1 日開放報禁，三大張也增為六大張，黨報受到嚴重的衝擊，原本經營不善的情況更加惡化。1 月 13 日蔣經國辭世，中央日報於 1 月 21 日派員前往榮總致哀⁵⁵。隨後，1989 年 4 月 7 日鄭南榕自焚，6 月 4 日中國爆發天安門事件，1990 年 3 月 16 日臺灣爆發野百合學生運動。政治情勢的變化相當快速，也逼迫國民黨加入改革開放的腳步，1991 年 5 月 1 日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並全面改選國大代表，1992 年裁撤警備總部，威權統治時期特殊的高壓統治組織走入歷史。

在黨營事業方面，直到 1994 年之際，國民黨黨營事業控股公司的轉投資事業已經超過百家，其中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也有數十家⁵⁶。不過，其中文化事業也已經呈現虧損的情況，亦被認為「自認它是為黨宣傳或工作，若黨營事業經營有虧損，黨應伸出援

55 同註 32，頁 267。

56 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黨營經濟事業的回顧與前瞻，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1994 年 12 月，頁 136。引用自此書中，前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委員郭金生之訪談。

手，予以補貼。」也因此，必須「設法多做廣告，增加收入⁵⁷。」1996年在主流與非主流的激烈鬥爭中，李登輝當選總統，黨營媒體也面對著高層政治的情勢轉變，但黨營媒體人事依然是以黨中央的意志為首，持續扮演為黨喉舌的角色。

1999年1月25日，廢除出版法，1999年2月中央日報社長由中華日報社長詹天性擔任，似乎有意朝中央日報與中華日報合併的方向進行改革⁵⁸，1999年6月，中央日報售予中影，但仍然租用四樓到七樓辦公室，作為編輯採訪工作使用，以及沿租地下一樓的印刷設備，中央日報從房東變成房客⁵⁹。然而，即便黨報已經走入衰退期，不過，透過限證、限張、限印等政策，讓黨報得以具有壟斷的地位，再加上補助、要求訂閱、贈閱等，以及新聞產製過程的操作，也致使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等依然堪稱是國內三大報。

二、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2000年的總統選舉，五組候選人的競逐，最後在藍營票源分裂的情況之下，由民進黨籍的陳水扁與呂秀蓮贏得總統選舉。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政治情勢丕變，中央日報的影響力也快速下降，黨報的未來，便成為即將在野的國民黨所必須解決的難題。2000年4月21日時任黨秘書長的邵玉銘在專案會議中決定，「仍決定繼續辦理，尤其針對中央日報，未來將扮演在野黨喉舌，言論加味麻辣，讓敗選變成

57 同註 45，頁 12。

58 黃東烈，臺灣民主化對黨營媒體經營影響之研究-以中央日報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5月，頁 92。

59 同註 13，頁 299。

黨營媒體的生存轉機⁶⁰。」當時，除了決定續辦之外，黨報的經營權問題也浮上檯面，也傳出時任投管會主委張昌邦有意將文化事業的經營權回歸文工會，「由於文工會重新掌握黨營媒體實權，包括中視、中廣、中央日報與中華日報等四家黨營媒體，都將統籌於黨主席旗下，嚴厲監督陳水扁政府⁶¹。」

因此如何整合中央日報與中華日報此二份「黨報」變成為當時甫在野的國民黨的難題，然而，中華日報的總社位於台南，有著地方報的優勢，同時也倚賴來自南臺灣的廣告、分類廣告與讀者訂報，再加上規模較小，支出少，虧損狀況比中央日報較輕微，因此，兩大黨報依然沒有走向合併，持續以一南一北的方式存在於臺灣的言論市場。直到 2000 年，為了整頓黨營事業，國民黨將八德大樓授予中央電影公司，中央日報也進行瘦身，2002 年人事縮編為 90 人，海外版停刊，然而到了 2006 年 5 月 24 日黨中央停止挹注中央日報，5 月 31 日被迫停刊。

2000 年的政黨輪替是中央日報存廢的關鍵轉折點，3 月 18 日的開票結果，讓長期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變成在野黨，喪失執政地位，導致中央日報的經營更加困難，過去或多或少可以「嗅出」國家重大黨政要聞走向的媒體優勢盡失，即便各公務機關或國營事業依然訂閱中央日報，但訂閱份數逐漸下降，零售報份也不受閱聽大眾的青睞，黨報的色彩，更讓編採部門頓時從「執政黨的啦啦隊」，瞬間變成「執

60 陳敏郎，中央日報要和連戰一起振作，2000 年 5 月 11 日。今周刊網站，<https://www.businessday.com.tw/article-content-80392-139237-%E4%B8%AD%E5%A4%AE%E6%97%A5%E5%A0%B1%E8%A6%81%E5%92%8C%E9%80%A3%E6%88%B0%E4%B8%80%E8%B5%B7%E6%8C%AF%E4%BD%9C%20%20p.54>，最後瀏覽日：2021/8/5。

61 同上註。

政的監督者」；再加上中國國民黨內部不斷質疑黨報的功能與意義，更讓黨報的處境相當艱難。

回顧中央日報的歷史，從 1927 年 3 月 22 日武漢的創刊，國民黨史絕口不提，在面對早期黨內的派系鬥爭，乃至主流與非主流，李登輝情結等，黨報夾雜在各方政治勢力之間，實在難以扮演真正媒體的功能，黨報沉重的歷史包袱，又是媒體但又必須服從黨的指示，此來自於報社內外環境的壓力，從國共內戰開始，乃至國府遷台，政治民主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內鬥與矛盾延續至此份報刊的最後一天。

肆、黨的文化工業

一、黨媒複合體

在從臺灣政治變遷與民主化發展歷程的角度出發，解析中央日報的發展歷程之後，本文提出「黨媒複合體」之概念，用以描述國民黨所建立的文化工業。此名稱來自於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簡稱：軍工複合體、MIC）⁶²，所謂的軍工複合體，乃指國家、軍事工業、軍火商、政府、國會等所形成的利益共生集團，透過此共生集團的運作。而黨媒複合體的建構基礎，乃是透過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形塑對於黨營媒體絕對有利的經營環境，壓制其

62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在 1961 年的告別演說中提出，乃指美國政治環境中存在著「龐大軍事體制與國防工業連結」，形成一種複合體（Complex），並提醒美國社會必須注意其對美國政治所產生的影響。後來的研究，針對軍工複合體提出許多研究，其影響面向包括：利益團體政治、國會政治、總統選舉與對社會的衝擊。可詳見李明正，美國「軍工複合體」探討，危機管理學刊，第 2 卷 2 期，2005 年 9 月，頁：51-60，或，Bruce G. Brunton,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2, No. 2, 599-606 (Jun.1988).

他民營媒體的生存空間，最後建立一個以鞏固威權統治為核心任務的意識形態部隊。

黨媒複合體之運作分三個部分，第一是組織架構，隸屬中國國民黨文工會，人事派任均須黨主席與黨中央的核可，第二是編採運作，採取社長與總編輯共治制，日常新聞並非固定送審或送核，但由社長與總編輯、總主筆與編採部門幹部共同決定，衡量黨中央立場、當前政治情勢與輿論反應等因素，進行新聞的採訪編輯與寫作，第三是營運管理，表面上如同一般報社的日常營運，銷售、廣告、訂閱等，但實際上卻是最高的統治權力透過黨政軍特與各級行政部門，嚴格控制著黨報的運作，以作為箝制人民思想的統治工具。

黨媒複合體透過以威權體制為運作核心的嚴厲管制手段，組織架構以黨中央為核心，嚴密控制的編輯採訪運作，並在營運管理上，為威權政黨而服務，並效忠黨中央的領導。除本文前述之外，亦可從過去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批評，顯見其運作模式。威權政黨嚴格限制著民營媒體的經營，引發知識分子的批評，由雷震、殷海光等人所創辦的《自由中國》即在 1950 年代屢屢提出批判⁶³，當然此舉也造成國民黨的不滿，最後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等人逮捕，雜誌乍然停刊。其中，1958 年 9 月 16 日第 19 卷第 6 期《自由中國》社論，〈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⁶⁴，直指新聞界的「內情」，可探究當時黨媒複合體的運作情況，其原文如下：

63 自由中國創刊於 1949 年 11 月 20 日，期間對執政的國民黨提出諸多批判，亦針對媒體政策有所質疑，因此於 1960 年 9 月 4 日，遭到國民黨壓制並停刊。

64 自由中國社論，扼殺民營報紙的又一辦法，自由中國，第 19 卷第 6 期，1958 年 9 月 16 日。

「熟悉新聞界內情的人們無不知道，這次報紙加張，完全是出於某大黨報的主動，其目的是在於拿一種『割喉式』的競爭把一些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民營報紙致於死命。政府之所以決定放寬篇幅限制，祇是為了支持此一黨報的企圖而已。」，「惡性競爭，也即憑藉政治力量的競爭，其方式就我們所知者而言，即已有下列諸種：（一）在資金方面，官報黨報常能從臺灣銀行或其它金融機構獲得大量低利貸款，而民報則獲得貸款甚為困難，因為臺銀及其它金融機構都掌握於政府之手。（二）在設備方面，官報常能很方便的獲得外匯配額，隨時擴展與改進，而民報則無此方便。（三）在發行方面，有些民報根本上禁止軍隊閱讀，而官報黨報則由政府與黨的力量協助推銷。（四）在廣告方面，政府機關公告集中刊載於官報黨報，民報僅得分潤其餘額，即此餘額，亦隨時可以藉故（『自立晚報』與『商工日報』之廣告被省府於本年七月取消，便是眼前最好的例子。）取消。競爭的起點如此，豈得謂之公平？」，「但我們必須指責，政府支持官報黨報進行惡性競爭的動機，殊不正當。這是扼殺民營報紙（也就是扼殺言論自由）的一貫路線之一新的發展。本來祇是不讓新的民營報紙產生，現在却是進一步企圖把已經存在的民營報紙亦一併予以扼殺。真實動機如此，決非一些拙劣的藉口所能掩飾。如果我們的指責是錯誤的，那麼請政府迅速即開放報紙的登記以表明心跡。」

自由中國透過社論直指，當時的執政黨利用資金、發行、廣告與訂報的「協助」，讓黨營媒體得到許多「方便」，此舉不但造成不公平的媒體競爭環境，更壓制其他民營媒體的生存。而黨媒複合體執行壓制言論自由的任務，其最高的理由就在於「國家安全」，以最富批判性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為例，從 1949 年 11 月 20 日到 1960 年 9 月 4 日，從創刊到最終被扼殺，就是臺灣警備司令部以叛亂罪逮捕發行人雷震，當時政府即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壓制反對的異議聲音，讓國家安全感發揮到極致，情治單位就覺得「人人可疑、事事可疑」，

造成人人自危的現象⁶⁵。

威權政黨動輒高舉「國家安全」的大旗，壓制言論自由，目的即在鞏固獨裁者的統治地位，除了上述的法律手段之外，更透過由行政機關與情治單位聯手的威權體制，戕害言論自由。由總統府、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四組、六組、教育部、僑委會、外交部、內政部，及國防部總政治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等，以正式會議或非正式會議的形式，依「法」執行查禁書報、警告、罰款、扣押、停止發行、撤銷登記等嚴厲處分⁶⁶。而 1958 年 6 月 28 日實行的出版法，授權內政部對於觸犯或煽動內亂、外患罪的出版品，得以停止發行或禁止出售，此法被抨擊違反憲法人民有出版自由之規定，但執政當局依然凍結臺灣報紙的發行；不過，1960 年 7 月 1 日特准「英文中國日報」創刊，一度讓社會誤以為執政當局有可能開放報禁，但此期待隨即落空。

然而，報禁持續，但一言堂的言論市場，已經無法滿足社會大眾對知識的渴求，黨報的公信力遭受質疑，也讓黨報面對著銷售不佳、收入逐漸減少的壓力，因此 1964 年起，實施村里長報制度，由中國國民黨四組要求各機關訂閱中央日報，1967 年 2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常會中也決定，「關於《中央日報》航空版因增加寄送兩千份所需之經費問題，可與交通部從政同志協調研究，或以免費寄送方式，或另列專案預算，以謀求解決⁶⁷。」顯見中國國民黨利用執政的優勢，意欲繼續維繫黨報的生存。

65 費希平，諤諤集，振文印刷，1978 年 11 月，頁 108-109。

66 自由中國社論，治安機關無權查扣書刊，自由中國，第 21 卷第 1 期，1959 年 7 月 1 日。

67 轉引自《蔣中正年譜長篇》，第 12 冊，頁 385，原出處：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七四次會議紀錄（民國 56 年 2 月 15 日），黨史館藏，館藏號：會 9.3/274。

1960、70 年代，大眾傳播工具幾乎完全控制在政府及執政黨的手中，相關刊物的言論，「代表官意者多，代表民意者少」、「大都是在一片歌功頌德聲中自我陶醉」，因此，社會上也興起開放報禁、減少對輿論控制的批評聲浪⁶⁸。但中央日報依然堅定擔負起黨報的任務，1978 年 12 月 19 日副刊刊出南海血書，「記述越南淪陷後，一家十一口遭共產匪徒殺害慘絕人寰的作品」，「各界深受感動，也同表憤慨；各校都自動選為教材，以加深青少年對於共產暴行的認識⁶⁹。」黨國體制不但要求各級學校閱讀、撰寫心得，更透過以黨報為首的黨營媒體隊伍，大力宣傳，製造恐共的氣氛，利用維繫政權的精神號召，穩固著威權政黨手中的政權。

黨媒複合體背後最大的權力來源，即是龐大的軍警檢調特情治系統，並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以「加強文化審檢措施」；透過由上而下的威權統治系統，串聯警備總部、警政署、各地警察局、新聞局、調查局、省（市）新聞單位、文工會、國家國安局等單位，執行壓制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命令。其手段相當多元，包括：執行加強縣市文化工作執行小組編組、地區文化情報蒐集、建立印製與販售不法書刊之完整資料、頒發文化情報蒐集要項、接獲情報立即完成審處及查扣作業、電傳查禁令、函及印發查禁通知、集中人力，全面執行查扣、每季策辦「春風專案」掃蕩、對違法言論個案處理、違法發行問題、分別訂定獎懲辦法，認真辦理獎懲、編設文化工作執行分組、專人承辦文化審檢業務、執行查扣地區文化情報蒐集、建立印製與販售不法書刊之完整資料、頒發文化情報蒐集要項集中人力，全面執行查

68 同註 65，頁 156。

69 邱家宜，臺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傳播文化與政治，第 9 期，2019 年 6 月，頁 1-30。

扣、配合警勤區迅速取締、對明知故違之書店印製發行商依法處理、分別訂定獎懲辦法，認真辦獎懲、協助省市各縣市爭取編列年度預算專人承辦文化審檢業務、執行查扣、每季策辦「春風專案」掃蕩、對轄內書局（攤）全面清查建立資料、認真辦理獎懲偏激刊物對政府、元首、年號等之不當用語之研究處理、專案研討「三十年代文藝」與「武俠小說」解禁問題、有關「辯駁導正」、「教育大眾」、「疏導溝通」等問題、地區文化情報蒐集、對違法言論當事人依法追訴嚴懲不法以朝炯戒。（請見附錄二）

其中，黨媒複合體也透過介入媒體的編採過程，以壓制言論自由。1986 年 5 月 19 日，鄭南榕等人發起 519 綠色行動，抗議國民黨實施長期的戒嚴、迫害言論自由與反民主。面對民主改革的壓力，黨媒複合體依然頑強抵抗，希望能壓制住民意的反抗。1986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創黨當天晚上，國民黨文工會即打電話給各大媒體，「協調」各報不要刊登此新聞，因此隔天日報，僅有中國時報刊登一小部分，「中央日報一字不登⁷⁰」。1989 年 4 月 7 日鄭南榕自焚，對國民黨鉗制言論自由做出極大的對抗，之後，社會各界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運動越來越激烈。

黨報持續在黨國體制的庇護之下生存，各部會也頻頻伸出援手。特別是海外版的寄送，「航空郵寄費則由教育部編列補助經費」，另，以外交部為例，從 1991 起編列預算，訂閱中央日報寄送給旅外的退休使節，直到 2002 年民進黨執政，才停止贈閱。教育部的「歷年補

70 邱萬興，臺灣關鍵年代：民進黨的誕生（1986-1987），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2021 年 9 月，頁 112。此段過程引述自，亞洲人雙周刊總編輯司馬文武之後在 10 月 15 日的第 118 號雜誌上披露此事。

助委辦中央日報清冊」也顯示「海外版航郵費補助」，1979年就編列了2,652萬元，並逐年增加，到了1988年已接近1億元⁷¹，以及。而根據黨產會公布的資料，2007年8月14日，教育部檢送「教育部代購中央日報轉贈海外留學生支出金額表」一份予財政部。在此表格內，根據統計，自民國68年至89會計年度（1979-2000年）間，教育部代購中央日報轉贈海外留學生支出金額約達9億9715萬餘元⁷²。

國民黨經常性的運用配合政策執行為理由，直接挹注給黨營企業⁷³，針對中央日報，透過贈閱、海外版航郵費補助、委辦補助等方式⁷⁴，由省政府轄下的各級政府編列預算，補助村、里、鄰黨訂閱報紙。另外，若是公民營單位，甚至由文工會直接發函請求訂閱中央日報⁷⁵。然而，政府各級單位透過各種方式「協助」中央日報的金額幾乎無法精確統計，數十年來政府委辦、補助中央日報的總金額，幾乎是一筆無法追溯的帳目⁷⁶。

期間亦發生中央日報向黨爭取報費卻落空的插曲，例如：1994年至1996年，因面對立委與總統大選，為了加強為黨宣傳，中央日報辦理（國民黨）小組長贈報，時間長達20個月，報費總計5億多，等到報社向國民黨中央求援想要爭取經費，但卻遭到拒絕，後來只得賣

71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記錄，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臺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2001年12月01日，頁107，以及，羅承宗，黨產解密：小豬對大野狼的不公平競爭，新臺灣國策智庫有限公司，2011年12月，頁79。

72 參閱黨產會網頁，<https://www.cipas.gov.tw/stories/25?fbclid=IwAR212dBqxadD4ts1jdN3gC9vo6kwbXjAwfaNKwbync1A9ULBFS8wgA37g8Y>，最後瀏覽日：2021/9/1。

73 同註1，頁204。

74 黨產歸零聯盟網站，http://zero-kmt.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8055.html，最後瀏覽日：2021/8/1。

75 同註58，頁92。

76 羅承宗，黨產解密：小豬對大野狼的不公平競爭，新臺灣國策智庫有限公司，2011年12月，頁78-79。

掉臺北火車站前的舊址得款 9 億多，來補貼此財務缺口⁷⁷。此事也顯見到了中央日報的末期，黨中央對黨報的功能已經有所質疑，再加上時代變遷，報紙的影響力也日漸下降，因此最後致使中央日報財務狀況每況愈下。

在威權體制的恫嚇之下，為了捍衛強人政治的運作，言論自由並不存在⁷⁸，雖然有許多為人民基本權利而奮鬥之士犧牲努力，但言論市場只容許單一的聲音，唯有黨媒複合體所允許的黨營媒體或可受國民黨制約的侍從媒體，可以在臺灣社會公開的發行與流傳，國家機器更利用黨政軍情治系統全力協助黨營媒體的訂閱、發送。若從 1958 年 6 月制定出版法乃至 1987 年 7 月解嚴，1988 年 1 月 1 日正式解除報禁，乃至 1999 年 1 月 25 日廢除出版法，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整個輿論環境丕變，臺灣歷經此段長達 30 年以上言論自由的黑暗時期。

媒體產業的人才培育，也受到威權體制壓制言論自由的影響，相關新聞工作者或媒體產業從業人員，有相當的比例來自黨營或親國民黨之媒體。其中，雖然媒體立場不等於就是記者個人的立場，記者的個人立場也不等於就是媒體的立場，不過，威權體制的途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是否持續影響著臺灣媒體的工作環境？以及，黨營媒體的從業人員是否隨著民主化的前進，進而改變其「為黨喉舌」的使命？抑或，威權統治所建構的黨媒複合體，是否依然存在於現今的媒體環境之中？等都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究的問題。

77 同註 13，頁 11。

78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元照出版，1999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136-137。此書第一次出版為 1993 年 4 月。

二、左右為難的黨報

對於報社記者，經常有將知識份子或讀書人的期許所加諸其身上，期待記者能超脫自己與階級利益的偏狹視野，跳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所限制，而能夠客觀報導與公正發言⁷⁹。但在實務的媒體運作中，媒體從業人員經常必須夾雜在新聞理想、編輯台的意識形態，以及報社最高經營者的利益考量等之間，有所掙扎或左右為難。

黨報的黨性堅強，也來自於黨組織的最高決策機關。例如：1952年8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三八一次會議，指示《中央日報》業務：「一、《中央日報》由大陸遷臺很有功績，惟編輯及主筆比在大陸上還差，應即著手整理。二、《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同志因病不能到社辦公，應即遴選他人接替。三、其他黨報如《香港時報》等，應一併檢討。四、報紙辦得好，讀者愈多，對營業自有裨益。五、大家忠於黨，忠於革命事業，凡事不能以個人關係地位，影響業務之進步⁸⁰。」由黨直接指揮報社的人事派任，作為黨報就必須接受如此的任命，黨的意志透過接近一條鞭的人事制度安排報社的高層人事，至於編輯、主筆或記者等職務，就授權由黨所指派的高層（董事長、社長、總編輯或總主筆等）負責中層與基層的人事派任。

黨的意志也直接貫徹到編務與言論部門，甚至直接指揮新聞或言論的產製過程。1958年3月19日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六次會議亦討論「昨日看《自由中國》半月刊社論『中

79 黃順星，記者的重量：臺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远流圖書公司，2013年12月，頁26。

80 轉引自，蔣中正年譜長篇，第10冊，頁86，原出處：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474。

國人看美國的遠東政策』，就其內容而言，尚不可以認為此文即是該刊企圖顛覆政府之證明，今後黨報社論，凡涉及政治性者，必須力求內容見解之正確，否則如《中央日報》過去有關行政、監察兩院糾紛所作的幾篇社論，便容易受人辯駁。今後此類社論均應先由社論委員會澈底研究，不可只由一人擬撰⁸¹。」由中常會直接指示中央日報的社論撰寫方式，形同對黨報的直接指揮，黨部的從業人員豈敢不從，此運作模式即便沒有變成常態化，但揣摩上意或黨意，極可能成為黨報從業人員的慣性。

因此政黨色彩濃厚，是必然的結果，外界對黨報的印象也是極為深刻，此情況造成黨報經營的左右為難，也致使在威權統治體制之下，黨報的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尷尬。媒體如實報導的天職，受到黨報本身意識形態與特定人事制度的壓制，甚至只要提到當時反對黨的民進黨，就一律用「民X黨」、「X進黨」或「所謂的民進黨」來稱呼⁸²。此也延續其經營方向，「有黨性而無官氣，守原則而重內容，求利潤而貴報格⁸³」，黨性堅強的「天職」，成為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框架，因此，所呈現出來的新聞報導或言論，就必須符合黨的要求，也得貫徹黨由上而下的政策指令。

如此困境也反映在經營層面上，中央日報既是媒體的一種，但卻又是政黨所屬的報紙，人事、經費、經營與編採等無法完全脫離黨的影響，如此的矛盾讓中央日報的經營屢屢在二個光譜之間拉扯，一端是中央日報必須扮演黨報的角色，不需要自負盈虧，而是由黨支援，

81 轉引自，蔣中正年譜長篇，第 11 冊，頁 28，原出處：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六次會議紀錄（民國 47 年 3 月 19 日），黨史館藏，館藏號：會.3/36。

82 同註 70，頁 163。

83 鄭貞銘，百年報人（3）：一代新聞宗師，遠流出版，2001 年，頁 130。

另一端是中央日報是媒體的一員，必須以盈虧為首要考量⁸⁴。此困境也反映在人事與經營層面，「中央日報是由中國國民黨所創辦的一份具有長久歷史與政治使命的報紙，但中央日報也同時是我們這個民主已然高度落實的開放社會下的媒體一員⁸⁵。」也點破中央日報的矛盾地位，「中央日報一方面必然要努力反映執政黨的理念、立場、觀點與政策的意義，然則另一方面也必要努力反映民情民意民心民欲。這兩種定位自然難免使部分讀者或社會大眾產生質疑：是否會導致產生『媒體偏差』現象⁸⁶」，可見中央日報內部也充分了解作為黨報特殊地位所帶來的困境，也曾出版社論精選，提出解釋，但黨報沉重包袱，屢受外界批判，且難以自圓其說。

1965年國民黨更成立了「新聞黨部」，在各報社直接成立黨支部，支部主委即是該報的主管⁸⁷，由上而下的在新聞事業上灌注入黨的命令與意志。至於黨報記者是否必須為國民黨黨員？抑或，被勸說或詢問，是否加入國民黨？此部分留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然而，在民主化後，黨報是否依然受到黨的直接或間接指揮？中央日報的黨性堅強，就算在民主化後，依然是受政黨所控制，尤其是社論，經常受到「層峰」所影響，內部更稱「中央日報公婆甚多」，華夏投資、中央投資、投管會、文傳會、組發會、行政會、秘書長，乃至黨主席都有可能對某事件或某篇文章有所意見要表達，欲透過中

84 同註 13，頁 11。

85 中央日報社，李登輝理念的見證-中央日報八六年度社論精選，中央日報社，1997年。此段文字，出自本書的序，並署名為當時的中央日報社長黃輝珍所撰。

86 同上註。

87 轉引自，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臺灣報業，新聞學研究，第 95 期，2008 年 4 月，頁 183-212，資料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65）：第二次新聞會談實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

中央日報對外宣示⁸⁸。因此黨報的依然「黨性堅強」，就算走入民主化，政黨亦透過各種管道，試圖影響著黨報的新聞報導與言論走向。

另外，侍從報業也逾越了政媒的分際，兩大報社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老闆，不但列席國民黨中常委，甚至還利用國民黨的黨政集於一身的威權體制，捍衛其報社的利益，例如：1987 年自立晚報記者秘密赴中國北京採訪，讓兩大報社老闆「不悅」，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要求嚴辦，後來，當時的行政院新聞局停止自立晚報二年內的出國採訪申請，甚至以刑法第 214 條偽報不實的罪嫌移送法辦⁸⁹。至於報社的基層記者，也因服務的報社而有大致上立場的差異，甚至在採訪街頭運動新聞時，「一些比較支持反對運動的媒體，或是支持民主運動的媒體，會站在群眾身邊採訪；鎮暴警察的那一頭，有主流媒體的三台、中時、聯合、中央日報，都站在鎮暴車、水車上，那裡有制高點，在那裡拍很安全，不會受傷⁹⁰。」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取得中央政府的執政權，黨報的角色更顯尷尬，特別是表現在與總統府、行政院的新聞採訪互動上。曾任黨部高層認為，對中央日報的編採工作上，在記者會上被刻意忽視，安排總統與總編輯一起下鄉採訪被刻意略過，釋放獨家新聞也被刻意遺漏⁹¹。但此其來有自，國民黨成為在野黨後，面對新政府的施政，黨報的立場當然有所轉變，「中央日報以在野黨文宣報定

88 同註 58，頁 106。

89 同註 70，頁 249-250。

90 當時攝影記者曾文邦的回憶，引述自，鄭南榕基金會策劃，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 4 月。

91 黃東烈，臺灣民主化對黨營媒體經營影響之研究-以中央日報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5 月，頁 122-126。相關敘述，在此論文中，引述自當時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樊祥麟之訪談。

位，社論以陳水扁為焦點，大加撻伐」，從其中多篇社論可看出，其言論立場不再捍衛執政黨，而是鎖定新政府進行批評，反而捍衛在野國民黨的立場；形同從國民黨的化妝師，轉換成政府的卸妝師⁹²。因此，黨報與執政的民進黨之間的關係變成非常對立，此當然反映在新聞採訪上，導致黨報的經營更加不利，新聞品質也逐漸下滑。

在「黨的一份子」與「媒體的一份子」之間掙扎，再加上，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經常有人想把這個報紙拿到自己手中，以便運用，有機會就會『卡』他一下；人事不能穩定，是中央日報的一大弱點⁹³。」也讓黨報被迫或主動捲入政治鬥爭，此更不利於黨報的經營，最終黨報使得優勢盡失，最終只好走入歷史。

伍、結論

政媒分立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在任何的民主政治體制內，「政」、「媒」要完全分立，互不干擾也互不影響，但這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情況，不過，政媒之間保持著基本的分際，依然是民主政治非常基本的運作原則。然而，在威權統治時期，本文透過解析中國國民黨建立為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部隊，建立「筆的隊伍」，以黨報中央日報為首，透過掌握足以作為社會教育工具的文化機器，控制人民思想，壓制異議聲音，並阻止反對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在初期，黨國機器的確達到其壓迫人民的效果，再加上黨政軍特檢調司法等聯手建構黨媒複合體，傳遞統治者的政策主張，打擊異議者，讓臺灣度過長達 36 年的

92 同註 58，頁 109。

93 同註 13，頁 11。

報禁時期。

然而，中央日報從創辦，由黨所扶植，輔以戒嚴時期的高壓統治手段，執行報禁政策，透過「限證」（不發新報紙的登記證）、「限張」（報紙每天不得超過三大張）、「限印」（只能在登記所在地印報）等手段，壓制臺灣人民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在白色恐怖與反對運動醞釀時期，黨報更扮演汙名化反對者、曲解反對運動，以及塑造人民敵視反對者的角色。到了 1960 年代，侍從媒體興起，人民想要接受不同新聞資訊的期望逐漸升高，黨報的公信力逐漸下降，報份銷售量也慢慢滑落；直到 80 年代之後，民主化的聲浪高漲，國民黨開始面對國內外的壓力，經濟起飛也致使人民求新求變的意志更加堅定。

1987 年解嚴、1988 年開放報禁、1992 年廢除刑法第 100 條、1996 年總統直選等一連串的改革開放，直接衝擊黨報的生存根基，媒體環境丕變也導致黨報原本已經不穩的經營基礎日漸薄弱，2000 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成為推倒黨報的最後一塊骨牌。最終，即使中央日報堅持扮演其黨報的角色，但依然被迫走入歷史，這是環境使然，中央日報完成黨報的階段性使命之後，最後只得宣布停刊。

透過從臺灣政治經濟變遷的角度進而解析中央日報的發展歷程，顯見黨報的存廢與社會政治經濟變遷息息相關，媒體環境丕變，閱聽者的判斷更加敏銳，反應也更加快速。媒體的公信力建立在忠實傳遞事實的根基上，而不是對政黨的忠誠度上，黨報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國民黨選擇停辦黨報也是必然的結果。

威權政黨給黨報與侍從媒體「胡蘿蔔」，但對於持批判立場的媒體卻是「施以棍棒」，前者媒體用言論上與統治者站在一起，以換取

經營媒體的特權，也帶來行政補助與經濟利益⁹⁴，後者則必須面對統治者以法律與行政措施的壓制，重者取締、沒收、取消證號，輕者查扣、停止訂閱、利用黨營媒體進行言論攻擊。黨報接收到統治者給的「胡蘿蔔」，又要扮演媒體的角色，在位置上即處於左右為難的尷尬地位。

對於媒體而言，既要報導真相，撰寫評論針貶時事，但又要顧及黨中央的立場，以及黨內的派系人事問題，致使中央日報屢屢陷入左右為難的矛盾情境。媒體所仰賴的公信力，以及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感，快速的消耗殆盡，再加上更多媒體的出現，直接挑戰了黨報的權威與真實性。總之，黨報為什麼消失？原因不外第一、宣傳功能下降，第二、市場經營的壓力，第三、黨報包袱導致左右為難的窘境。

對於黨報的研究，未來依然有許多可能性足以探究，第一、國民黨直接指揮中央日報編採與主筆的內部文獻，其中，對於人事布局的指揮，例如：黨中央與各派系人馬如何安插中央日報社長、總編輯、總主筆等重要職務？若能透過深入的訪談，以及更多國民黨內部史料的出爐，勢必有更多的事實得以呈現。另外，除了黨報之外，其他黨營的電視台、廣播公司、期刊、雜誌，以及附屬於黨政軍的其他媒體，其運作模式也值得進一步探究。第二、在面對黨內派系鬥爭時，中央日報如何因應，相關鬥爭是否呈現在報紙版面或言論部門上？第三、中央日報的財務狀況，如何強迫訂報？黨中央或其他黨營事業如何進行財務的直接挹注？以及中央日報各地資產的流向與分配等。第四、內容、社論、重要新聞分析，是否受到源自於新聞製作者、新聞

94 同註 10，頁 115。

人物和新聞消費者等三者的媒體偏見成因所影響⁹⁵？甚或，國民黨中央或重要黨政高層如何直接指揮中央日報的議題設定、新聞報導內容，以及評論或社論的論述方向？期待未來若有更多史料出現，也能用有更多元的視角，將有助於解析黨報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對於解析當前的媒體生態，黨報或其他侍從媒體是否在當前臺灣的媒體環境中，造成途徑依賴的現象？媒體從業人員的屬性，以及新聞產製過程是否受到長達幾十年黨營媒體的影響？相關問題都非常值得探究。

95 同註 3，頁 227-264。

附錄一：中央日報與政治變遷之對照表

時間	政治變遷	中央日報
1927	4月·國民黨清黨 8月·國共內戰	3月22日·武漢創刊 8月·國共決裂
1928	6月·皇姑屯事件 11月·改組派	2月1日·上海創刊 6月·黨報條例
1929	改組派訴求改組國民黨	2月1日·總編輯制、社長 由國民黨中宣部長兼任
1932	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戰爭	改採社長制
1937	7月7日·蘆溝橋事變 8月13日·淞滬會戰 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	創廬山版
1938	6月11日·武漢會戰	復刊於重慶
1945	8月6日、9日·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 8月15日·二次世界大戰終戰	9月10日·南京復刊
1947	2月28日·二二八事件 12月25日·中華民國行憲	中央日報公司化
1948	5月10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 部分憲法 12月10日·聯合國人權宣言	11月·決定遷臺
1949	1月21日·蔣介石引退 5月19日·戒嚴 10月·白色恐怖大逮捕 12月7日·國民黨退守臺灣	3月12日·臺北續刊 7月20日·失火

1950	6 月 13 日 · 戡亂時期檢肅匪謀條例 6 月 25 日 · 韓戰爆發	3 月 1 日 · 蔣介石復行視事
1958	5 月 15 日 · 警備總司令部成立 6 月 28 日 · 出版法	8 月 23 日 · 823 砲戰 · 發動 勞軍捐款 9 月 1 日 · 一大張半擴增為 二大張
1962	2 月 9 日 · 臺灣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	1 月 21 日 · 購高斯印報機 連載反共義士文章
1971	12 月 25 日 · 聯合國 2758 號決議案 12 月 29 日 · 長老教會國是聲明	使用高斯輪轉橡皮平板機 彩色平版印刷
1972	1 月 10 日 · 雷震救亡圖存獻議	發行「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單名本 · 出書 20 萬冊以上
1975	4 月 5 日 · 蔣介石辭世 4 月 23 日 · 越戰結束	4 月 14 日 · 全體瞻仰遺容 4 月 16 日 · 追思特刊 11 月 11 日 · 蔣總統秘錄
1978	5 月 20 日 · 蔣經國就任總統	12 月 19 日 · 南海血書
1979	1 月 1 日 · 台美斷交 8 月 24 日 · 美麗島雜誌 12 月 10 日 · 美麗島事件	1 月 6 日 · 增設信望愛週刊
1980	2 月 28 日 · 林宅血案	
1981	7 月 2 日 · 陳文成命案	
1983	9 月 9 日 · 黨外編聯會成立	4 月 26 日 · 中央日報爆炸案
1984	10 月 15 日 · 江南案	10 月 8 日 · 八德路大樓奠基

1986	5月19日·519綠色行動 9月28日·民進黨成立	3月22日·八德路大樓上樑 11月1日·重新編訂「蔣總統秘錄」
1987	7月15日·解嚴、國安法	6月24日·遷入八德路大樓
1988	1月1日·報禁解除 1月13日·蔣經國辭世 5月20日·農民運動	1月1日·三大張增為六大張 1月21日·前往榮總致哀
1989	4月7日·鄭南榕自焚 6月4日·天安門事件	出版「世紀大屠殺」
1990	3月16日·野百合學生運動	
1991	5月1日·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國民大會全面改選	
1992	5月15日·修刑法第100條 7月31日·裁撤警備總司令部 12月19日·立法院全面改選	
1994	12月3日·省長、直轄市長民選	10月·解雇記者蘇諍案
1996	3月23日·總統直選	主流、非主流鬥爭 6月26日·陳水扁禁止刊登
1998	1月25日·廢除出版法 12月·凍省	
1999	9月21日·921大地震	大樓售中央電影公司
2000	5月20日·首次政黨輪替	黨報未來？
2001	9月11日·911事件	創立文教報

2002	8月3日·陳水扁發表一邊一國	人事縮編為 90 人 海外版停刊
2004	3月19日·319 槍擊案	
2006		5月24日·黨停止挹注 5月31日·實體報停刊

註：本表為作者彙整自製，參考資料：漢珍數位圖書公司的中央日報全球影像資料庫介紹，以及，中央日報編印，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1988年2月1日。

附錄二：威權時代「現階段加強文化審檢工作」責任區分

屬性	單位	工作要點
1 警備	警總（政六處） 警備地（分）區 各地警備司令部	加強縣市文化工作執行小組編組 地區文化情報蒐集 建立印製與販售不法書刊之完整資料 頒發文化情報蒐集要項 接獲情報立即完成審處及查扣作業 電傳查禁令、函及印發查禁通知 集中人力，全面執行查扣 每季策辦「春風專案」掃蕩 對違法言論個案處理 違法發行問題 分別訂定獎懲辦法，認真辦理獎懲
2 警察	警政署 省警務處 各警察局	編設文化工作執行分組 專人承辦文化審檢業務、執行查扣 地區文化情報蒐集 建立印製與販售不法書刊之完整資料 頒發文化情報蒐集要項 集中人力，全面執行查扣 配合警勤區迅速取締 對明知故違之書店印製發行商依法處理 分別訂定獎懲辦法，認真辦理獎懲
3 新聞	文工會 新聞局 省新聞處 縣市文化工作執行小組 縣市政府新聞單位	協助省市各縣市爭取編列年度預算 專人承辦文化審檢業務、執行查扣 集中人力，全面執行查扣 每季策辦「春風專案」掃蕩 對轄內書局（攤）全面清查建立資料 持續輔導印製廠商簽約

			<p>每年舉辦轄內出版經銷書店座談與表揚</p> <p>對違法言論個案處理、違法發行問題</p> <p>分別訂定獎懲辦法，認真辦理獎懲</p> <p>偏激刊物對政府、元首、年號等之不當用語之研究處理</p> <p>專案研討「三十年代文藝」與「武俠小說」解禁問題</p> <p>有關「辯駁導正」、「教育大眾」、「疏導溝通」等問題</p>
4	情治	國家安全局 調查局	<p>地區文化情報蒐集</p> <p>對違法言論當事人依法追訴嚴懲不法以朝炯戒</p>

註：此表根據 1984 年 10 月 17 日由警備總部陳守山上將所召開之「現階段加強文化審檢措施暨現存問題座談會紀錄」內容所製。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 James Joll 著，石智青校閱，葛蘭西 (A. Gramsci)，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 年。
2. 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自由中國選集-言論自由，臺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 年 7 月。
3. 中央日報，中央日報 86 年度社論精選：李登輝理念的見證，臺北：中央日報出版，1997 年。
4. 中央日報，蔣總統秘錄第 1 冊，臺北：中央日報社，1974 年。
5. 中央日報編印，六十年來的中央日報，1988 年 2 月 1 日。
6. 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黨營經濟事業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1994 年 12 月。
7. 今周刊，李登輝、連戰拖垮中央日報，今周刊，1998 年 7 月 19 日。
8.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 (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1 月，頁 221-262。
9. 朱彥碩，「臺灣光復」論述的建構—以《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 (1949-1987) 為中心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0. 吳燕玲，梁肅戎怒告黨報扣紅帽，新新聞，584 期，1998.05.17-05.23，頁 42-45。

11.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記錄，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臺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2001 年 12 月 01 日。
12. 李明正，美國「軍工複合體」探討，危機管理學刊，第 2 卷 2 期，2005 年 9 月，頁：51-60。
13. 李筱峰、陳孟絹，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臺北：玉山社，2015 年 2 月 17 日。
14. 李福鐘，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事業，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8 期，2008 年 2 月，頁 189-220。
15. 李福鐘、薛化元、楊玉菁等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1945-1960），臺北：國史館，2002 年 12 月。
16. 李福鐘、薛化元、楊玉菁等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八）：新聞自由（1961-1987），臺北：國史館，2002 年 12 月。
17. 周慶祥，黨國體制下的臺灣本土報業，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6 月。
18.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臺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 年 9 月。
19. 林淇漾，戰後臺灣報禁政策之形成，臺灣學通訊，第 85 期，2015 年 1 月 10 日，頁 20-21。
20. 林麗雲，威權主義下臺灣電視資本的形成，中華傳播學刊，第 9 期，2006 年 6 月。
21. 林麗雲，臺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79-1999，臺灣產業研究，第 3 期，2000 年 10 月。

22. 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臺灣報業，新聞學研究，第 95 期，2008 年 4 月，頁 183-212。
23. 邱家宜，臺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傳播文化與政治，第 9 期，2019 年 6 月，頁 1-30。
24. 邱萬興著，臺灣關鍵年代：民進黨的誕生 (1986-1987)，臺北：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2021 年 9 月。
25. 唐海江，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中央日報為中心，新聞學研究，第 97 期，2008 年 10 月，頁 127-177。
26. 夏士芬，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27. 徐詠平，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黨報發展史略，報學，第 1 期第 9 卷，1956 年，頁 15-23。
28. 翁智琦，反共所繫之處：冷戰前期臺港泰國民黨報紙副刊宣傳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 年 7 月。
29. 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30. 張世瑛，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 (1928-31)，國史館館刊，第 44 期，2015 年 6 月，頁 47-90。
31. 張富忠、邱萬興，綠色年代--臺灣民主運動 25 年，財團法人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2005 年 10 月 30 日。
32. 梁永煌、田習如，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臺北：財訊出版社，2000 年 1 月 21 日。

33. 陳正茂，日治及戰後初期臺灣政黨與政治團體史論，臺北：元華文創，2020 年 4 月。
34. 陳志昌，再起爐灶--《中央日報》的遷臺與在臺發展優勢，暨南史學，第 18 號，2015 年 7 月，頁 83-111。
35. 陳佳宏，「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事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93-194。
36. 陳國祥、祝萍，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8 年。
37. 陳敏郎，中央日報要和連戰一起振作，今周刊，2000 年 5 月 11 日。
38. 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39. 費希平，諤諤集，臺北：振文印刷，1978 年 11 月。
40.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2020 年 5 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41. 黃東烈，臺灣民主化對黨營媒體經營影響之研究，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5 月。
42. 黃順星，記者的重量：臺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2013 年 12 月。
43. 黃順星，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臺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第 104 期，2010 年 7 月，頁 113-160。

44. 楊秀茹，中央日報營運變遷與社會變遷關係之研究-1949-2006，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系碩士論文，2013年6月。
45. 鄭貞銘，百年報人(3)：一代新聞宗師，臺北：遠流出版，2001年。
46. 閻岩、周樹華，媒體偏見：客觀體現和主觀感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0期，2014年。
47. 薛化元、楊秀菁，戰後臺灣新聞自由的歷史考察(1945-1988)，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1-2411-H-004-027-，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
48. 薛心鎔，編輯台上-三十年代以來新聞工作剪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6月2日。
49. 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一)，臺北：國史館，1966年12月。
50. 羅承宗，黨產解密：小豬對大野狼的不公平競爭，臺北：新臺灣國策智庫有限公司，2011年12月。可參閱：https://billy3321.gitbooks.io/decipher_kmt_property/content/3-3.html。
51. 蘇童譯，David Strömberg 著，Media and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 7:173-205 (Volume publication date August 2015)，轉引自，媒體與政治，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p.48-66。

二、英文部分

Bruce G. Brunton,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2, No. 2, 599-606 (Jun.1988).

三、網路資源

1. 今周刊網站 · 2000/5/11 ·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0005110025/%E4%B8%AD%E5%A4%AE%E6%97%A5%E5%A0%B1%E8%A6%81%E5%92%8C%E9%80%A3%E6%88%B0%E4%B8%80%E8%B5%B7%E6%8C%AF%E4%BD%9C%20%20> · 最後瀏覽日：2021/8/5。
2. 華視新聞網網站 ·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198312/198312121826786.html> · 最後瀏覽日：2021/7/3。
3.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中央日報全球影像資料庫介紹網站 · https://www.lib.nccu.edu.tw/uploads/bulletin_file/file/5ed871cb1d41c867e3000f44/%E4%B8%AD%E5%A4%AE%E6%97%A5%E5%A0%B1.pdf · 最後瀏覽日：2021/7/12。
4. 黨產會網站 · <https://www.cipas.gov.tw/stories/25?fbclid=IwAR212dBqxadD4ts1jdN3gC9vo6kwbXjAwfaNKwbyncIA9ULBFS8wgA37g8Y> · 最後瀏覽日：2021/9/1。
5. 黨產歸零聯盟網站 · http://zero-kmt.blogspot.com/2011/12/blog-post_8055.html · 最後瀏覽日：2021/8/1。

The Central Daily News in Authoritarian-era Taiwan

Jen-Wen Cheng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based on an overall study of literary reviews and political change, lies i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media served for authoritarian parties in Taiwan after 1949. The paper particularly focuses its attention on the mouthpiece of Kuominta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the Central Daily News, examining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party-run newspaper, including issues such as its being a medium with ideology for circulat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forming public opinions, fighting against dissenters, stabilizing the society, and so on. Among many things, the newspaper, as the core “party-media complex” created by Kuomintang, was faced with contradictions in terms of its editing and managing ability as well as the dilemma of instant draining its credibility and reliability as a print media because of political factional struggles. In addition, under the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change of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he Central Daily News found itself in a series of revenue loss. Eventually, the business of the newspaper was put into trouble and after fulfilling its tasks in stag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ewspaper was suspended in 2006. The paper aims 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s run by political parties. Research efforts have been dwelled in examin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ature of the print media and its role as the party mouthpiece. With both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nvestment of political resources, the privileged status of the party-run newspaper has been also examined. The author has attempted a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party-run newspaper, hoping to offer futur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projects.

Keywords: the party-run newspaper, the party assets of Kuomintang, the Central Daily News, media in Taiwan, newspapering.